

问字散记

学、问、思、辨、行“五字经”

去年(1997年)，为着纪念已故著名文学家王统照(字剑三)先生百年诞辰，文学界举行了一些活动。我在报上看到臧克家先生以及剑三先生的公子立诚兄写的纪念文章，勾起了对剑三先生的一些片断回忆。怀旧之思，不能自己。

剑三先生的胞姊，是我的伯母，因此我也算是忝在甥辈了，跟着堂兄堂姐们称呼他“二舅”。加上剑三先生夫人，是家继祖母的侄女，我们都呼作表姑的，于是亲上加了一层亲。正因此，父辈间与剑三先生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他欧游时，不时有明信片寄给我的父亲。作为小辈的我，虽然从上初中时读过他的文集之后，就十分仰慕剑三先生的道德文章，可是受居处两地的限制，无缘获得多向他讨教的机会。现在记起的见面，算来也只有

四次。一次是 1945 年秋,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山东,特意到我家探亲。两次是 1947 年的夏季和冬季,我在北京求学,途经青岛时,先后到观海二路剑三先生府上拜谒过。还有一次,是在 1949 年建国前后,剑三先生到省里开会,会议期间到我工作的华东大学参观,不期而遇,我上前问安,他也立即认出了我,并亲切垂问近况。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初见时。未见时,总想着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作家,该是何等神气,何等高不可攀。可是抱着惴惴的心情去拜见时,见到的却是身材不高、和善可亲、装着俭朴、一口乡音(剑三先生与我的外祖家是同乡,都是诸城人)的“老人”(其实那时他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觉得他老,是由于我还小)。如果把他放到我们中小学老师的行列里,简直挑不出什么不一样来,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的特殊派头。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懂得了与大作家见面机会难得,于是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纷纷拿出当时时兴的用各种彩色纸张订成的“纪念册”,请剑三二舅题词留念。他不但一概应诺,而且郑重其事地选词,郑重其事地书写,没有丝毫草应付晚辈小儿的游戏态度。我那本纪念册,可惜早已遗失,有幸的是,剑三先生给我写的题词,五十多年来从未忘过。甚至那凝重端庄、墨色浓郁的字体,至今闭目想来,仍然如在眼前。记忆如此清晰,大约与剑三先生在我少年时心目中的知名度甚高有关,但也与他对晚辈所抱的诚恳态度和殷切期望有关。剑三先生给我的题词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伟志甥属剑三某年某月某日。”题词按旧例竖写,三字一行,自右至左凡五行。题款用较小字,概用楷书,一笔不苟。书法遒劲而又透露出清雅的书卷

气，刚柔相济，令我这样的学书未成的后生小子，实在爱不释手。

不过，十四五岁的我，当时并不真正懂得剑三先生给我题词的深意。回想起来，那时大约是觉得剑三先生给我写的，是一种很常见的勉励后学的话，要我学好就是了。小时读过《中庸》，也粗略地领会到这几句话是好话，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古老的格言里包含着什么不得了的深义。大约十来年后，蓦地得知朱熹老夫子正是把《中庸》上的这五句，定为白鹿洞书院的箴规，不免怦然心动，想起了当年剑三先生给我的题词，开始领悟到那是他特意选了这么几句来提示我注意治学态度的。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代，那几句旧时的治学箴言是不是还有什么价值，在长时间里，我想不明白，也没有认真想过。

1967年，和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关锋（他是我所在的研究组的组长），向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发动批判，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文化继承一事的复杂性。本来，我学了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道理，并衷心拥戴之后，一直没有再往深处考虑过，既没有想过旧文化是否可以定性为非民族的、不科学的、反大众的，也没有想过对旧文化究竟应该怎样继承才能行得通。思想幼稚，当然就把难题看成很好解决的易事，觉得对待旧文化，无非是把坏的丢掉、好的留着就是。冯先生提出创议，主张对待旧有哲学命题，用“抽象继承法”，取其普遍性意义，弃其具体性意义，这一下便把应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当时我觉得冯先生的主张并不难懂，以为无非是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化继承方法。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

唯心主义辩证法,我们对待古代的“忠”“孝”之道,就都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处置的。比如我们对待“忠”这个范畴,就是只取其忠诚的“普遍性意义”,而舍弃其忠于君主的旧的“具体性意义”,并另赋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的“具体性意义”。这也不算我们的创造,孙中山早就发表过这类意见,只不过他没有从方法论上做出概括罢了。不过,对于在 50 年代的争论中冯先生的这一见解,我当时也觉得确实有些地方并没有说得太明白,比如旧时的文化命题是不是一概都要“抽象”继承呢?难道有些命题,如某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之类的古训,不是可以直接的具体继承吗?至于关锋的批判,那就叫人无法看懂了。他的意思,似乎是认定一切旧哲学命题,只能“批判地继承”;亦即一概要经过“批判”才能谈到继承也。我当时想,“批判地继承”只是就对待文化遗产的总体而言,并不是说一切具体的概念、范畴、定义、命题,都必得经过一番“批判”的清洗。“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学如不及”之类,何须要做“批判”?何须必得经过批判而后才能继承呢?记得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憋不住,说了几句。大意是说,在我看来,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确有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哲学命题本来也是可以具体继承的。犹如一幢旧房子的砖瓦,只要完好,不妨直接拿来盖新房子用。话没说完,就被关锋他们倾盆大雨般的批驳打断了。当时我毕竟年轻,不会把理由讲细讲深讲周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也就这么不了了之。后来我才明白,我的这种意见,比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更加“右”了,自然为“左”派见解所不能容。有幸的是,后来的几次思想运动中,居然没有人想起过我当年发表过这种言论,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批

注的《论语》中,说‘学而时习之’;所学为何,也有具体的阶级内容,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故而也只能批判,不能直接继承,也不能抽象继承。这种气势汹汹的大批判,逼得冯友兰先生只好表示“口服”;不过当时读过此等高论而心不服的,除冯先生本人外,也还大有人在,区区也算一个。

如今纪念王剑三先生之际,不由得想起五十年前他给我写的题词,从而又引起关于文化继承问题的上面一些片断回忆。这时才恍然省悟到,“学、问、思、辨、行”这“五字经”,确乎有着亘古长青的生命力。而且,它和“学而时习之”一样,是古今中外一切真心治学的人,都应该深切体会、切实遵守的基本的学习准则和基本的学习方法。

学、问、思、辨之道,孔子本人及其受业弟子们已有所论述,不过比较简略。例如,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惛,思而不学则怠。”子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与此旨相关的话,在《论语》中还很多,只是比较分散,常是在议论别的事项时夹杂说到。但是,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其创立时,便对学习一事(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教育)在社会人生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并且由此而为治学设置出了一套很高的标准。归纳起来看,《论语》中对此至少已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

一是学习的内容,应务求博大。在儒家看来,学习必须是志存高远的,是为着修、齐、治、平而学习,是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而学习,所以学习内容就不能满足于一技一艺。孔子之不满于樊迟学稼学圃的提问,除了他有着轻视生产劳动的错误观念外,或许也与他老人家觉得提出这种问题就颇有些想‘学种技艺混饭吃’的味道有关。

二是学习的精神，必须执着有恒。儒家明白，学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是可以浅尝辄止的游戏，所以要持之以恒，要“**时习**”；要“**笃志**”，不厌不倦，不懈不怠，方能学出良好效果，学出优良成绩。

三是学习的方法，贵在善于思考。儒家看到，学习固然是接受知识，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被动的接受知识的过程，而是更需要仰仗于学习者发挥主动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探索。这意思大致就像现代人所说的，“**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不能不看到，儒家是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重意义，所以他们才特别强调“**学**”和“**思**”的结合，强调学习过程中必须勤于思考、善于思考。

孔夫子固然标榜自己遵循的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以示忠于祖述尧舜文武周公的信念，但是，应该看到，他实际上最赞赏的学习态度，却是颜回那样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的充满悟性的深思精神。他并且认为，要想做到善于思，最好的办法，就是善于问。不知道的，或者不大明白的，要“**每事问**”。“**问**”，就是虚心求知。善于在看似平常处发问质疑，问他一个为什么，这是任何学习过程得以深入的门径。当然，问也要得法，首先就必须“**切**”；问的是地方，恰是问到要害处，无疑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事半功倍。当然，问题提出来，并不等于学习过程的完成和思考的终结，相反地，提出问题的直接作用是在于启发思考，促成进一步学习，以求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治学既然是一个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那其中自然需要做好“**辨**”的功夫。这就是说，要取得能够辨别

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本事。可以说，做好这种“辨”的功夫，是完成“问”和“思”所预期的结果。因而，“辨”的功夫做的如何，也就是学习成效的初步检查和验收。

不能不承认这套学、问、思、辨的治学之道，实在是有着很普遍的性格，可以贯通古今。《中庸》对这种治学之道的概括和阐释，把它完善化、系统化了，这算得上是一项很重要的贡献。《中庸》的治学“五字经”，不但把隐含在“问”与“思”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的“辨”的功夫，独立了出来予以强调，而且还做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补充，把“行”纳入到治学的过程中，作为治学过程的内在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学习过程的“完成式”阶段——列了出来。学习得究竟怎么样？最终还得看它能否应用，能否付诸行动。

《中庸》还进一步把学、问、思、辨、行，分别给予特定的质量要求，即“博”、“审”、“慎”、“明”、“笃”的定性。学习内容要广泛，提出问题要周详，思考问题要严谨，辨别是非要明智，这四项做下来，便算得是做到了“择善之功”，学到了真知。下一步则是把学到的正确知识付诸实践；“固执”而行之；“勉而行之”（朱熹注义语，见《四书集注》）。应当承认，这五项的配置，是相当严整的。所以程颐才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参见朱熹《四书集注》）这样便为并非“生而知之”的普通人如何通过勤奋、持久、正确的方法，去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达到“自诚明”的目标，立下一套相当完备的箴规。人们只要坚守这样的箴规去学习，就可以改变知识状况和精神状态。气质改变了，愚昧变作聪明，柔弱变成刚强，自可担当大任，完成大事业了。

儒家的后继者，如程颐、朱熹等，是不是把这套有关学习

的“五字经”过分完美化、理想化了呢？这大约是难免的。五项都能做到，是不大容易。况且，这些规定总嫌语焉不详，甚至不免叫后世看起来觉得有些故弄玄虚，但是，不能不承认它从总体上为人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概括出了一条可寻可守可行的合理途径。放诸古今中外，这种治学“五字经”，确实有着普遍有效性。它的有效性，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毋须乎“抽象继承”，也毋须乎“批判继承”，照着做就是了。至于能够领会到什么程度，运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个人精力付出得多少了。

程朱对《中庸》治学“五字经”的解释，有着突出的弱点，这就是他们只着重强调了学习态度的‘诚’与‘固执’，而忽略了治学“五字经”中所包括的十分突出的独立思考，亦即充分发挥学习者主体作用的‘问’‘思’‘辨’的独立钻研精神。如果说‘学、问、思、辨、行’五字经中的博学与笃行，是举凡诚心向学者都易于领会的一般常识的话，那么应当说，强调怀疑与思辨的创造精神，才是“五字经”的活脱生生的灵魂。不管程朱对后者的忽视，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断定的是，后世以章句为学、八股为务，以及泥古崇经的保守陋习流行，是与他们忽视或贬斥致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大有干系的。

事实上，中国‘学问’一词的妙处，不仅在于强调了‘学’，而且在于强调了‘问’，强调了‘学’与‘问’的统一，即承受旧知与创造新知的统一；“问”正是从被动受知到主动求知转化的契机。这正是《中庸》治学“五字经”中所包括的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

我是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才恍然觉悟到，当年少不更事，未能领会剑三先生给我题词的殷切期望的深意。大

半生来，我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没有能够自觉地继承先人这份宝贵的经验总结，不单学识未求广博，而且还常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经常不能独立地理智地去问、去思、去辨，缺乏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的自觉理性精神。这种思想上的盲目性，导致学业上和行为上的盲目性，结果自然只能是学之不博，问之不审，思之不慎，辨之不明，从而也就更加谈不上付诸实行的笃了。由是，我从未做到“自诚明”，所以到如今仍然只好算是一个时常参不透许多事理的糊涂人。这赖谁呢？只能赖自己。

拉杂写来，也算是聊寄对王统照先生的怀念之情吧。剑三二舅借古训给我的教诲，自当永志不忘。

1998 年 7 月 9 日于莱茵河畔之根斯海

学贵知疑

《荀子·大略》中说：“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大概是从这以后，就“学问”“学问”的这么叫下来了。可是“学”何以要连上“问”呢？“问”与“学”何干？这是我长期以来想都没想过的事。

其实“问”字早在《论语》中已多见，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各种身份的人向孔子提问题，《论语》所记，总有百把处。学生问得一重大问题，孔子还会称赞说：“大哉问！”

《中庸》里更系统地把“诚之者”的“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且对于“问”的进一步阐释中强调：“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拗劲儿。

兴许是中国的教育，早就背离了圣人

的原旨。“八股”一兴，就不大听说有老师鼓励学生们提问题的事了。私塾里是只重“灌输”，新式学堂里好像也还是不大能改掉这种积习。先生讲，学生听；先生提问，学生回答，几乎占据了课堂授受的全过程；学生问先生答，或者学生自问自答，似乎一向是做的很不够的。至于一个又一个地提出疑问，问得老师瞠目结舌，总是不大讨老师喜欢，甚至有被看做是故意和老师过不去的“刁徒”行径的危险。

我小时候基本上是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学得知识的（固然从小到大，也遇到过不少注重后发的循循善诱的明师），正因为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总是迷迷糊糊，弄不明白“问”与“学”的关系，或者说，弄不清楚“问”在“学”中具有何种意义、何种作用。虽然少年时也听到过什么“三 W 主义”，其中一条就是遇事要问个“为什么”，可是总也不能身体力行，不懂得这个“问”字如何了得。大约是后来遇到“批判胡适”的运动，看了些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怀疑主义”倾向的文章，头脑就愈加糊涂起来。记得“反右”前夕，一些青年们交谈学习方法的心得时，有一位主张：凡是学习，总先要有个怀疑的想法，解了这个疑，学习也就深入了。我当即起而反驳说，难道学习一切知识，都要首先怀疑一下吗？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知识难道也要先怀疑它一下吗？现在想来，固然当初主张怀疑的那位讲的不大明白，但原则上，他是对的，而我是错了。

平心而论，就是在懵懂状态中，也还偶有提得出疑问来的时候。比如就是在“反右”之前，我在研读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时，看到近世出版物对李鸿章办北洋水师事的一片责骂，心头陡然发生了疑问。心里想，李鸿章办北洋水师，办得并不好，不但管理上弊端甚多，而且更无指挥方略，终至丧师

辱国，罪不可恕。可是，办北洋水师事，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难道仅仅是一桩罪过吗？重海防而兴水师，总得算是中国海军史的开端吧？那么，办北洋水师这事业，总算是中国近代军事上的一项创举，它的积极意义，总不应因其管理无方和战事指挥失误，而一概抹杀吧？疑问出来了，拿捏不稳，便去向黎澍同志请教。他听到我提出了这么个问题，竟然喜上眉梢，连声说：“对，对，对。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不过，这类算得上有点“审问之”味道的事例，在我长期的学习生涯中只是偶然发生的，很不自觉的。直到受到那个“文化大革命”的五雷轰顶般的轰击，才被惊醒，渐渐懂得了“问”在“学”中之大用——这不就是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通的独立思考精神吗！

“问”，通俗些说，无非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意思。管他书本上载了的，师长说过的，都不能“尽信”，更不能迷信接受的知识、道理，不但要明白它“是什么”，而且要问它一个“为什么”。读书也好，听讲也好，能够动脑子，提出问题，发现疑难，以求解决，自然是探讨真知的途径。陈白沙说得好：“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者，觉悟之机也。”

在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件轻易便可以做得到的、做得好的事。读那些被奉做金科玉律的圣贤书，能够提出疑问来，则更难。“审问之”，实在是个高标准；不下功夫，不钻进去，不动脑筋，不自觉地开拓知识、增强思辨能力，是难以办得到，或者是难以做得好的。所以，吴宪斋才说：“书不读熟则疑不出，事不深思则疑不生。大抵无疑可问者，只是浅尝浮慕，未尝着重用功耳，非无真疑也。”想想实在惭愧，

青少年求学时有那么几年功课还算差强人意，事实上呢，却是自恃小聪明；“浅尝浮慕，未尝着重用功”；所以对那些“书”或“事”中本有的“疑”，想不到，识不得，提不出，抓不住，学习所得自然多是皮毛。到大了，这毛病改起来仍旧很难，所以才常常陷到愚昧迷信的泥坑，老是傻傻地“无疑可问”。

提得出疑问不容易，疑问提得是地方更不容易。“每事问”，那是入了“太庙”才采取的态度。学问之道，能够事无巨细都“每事问”吗？那显然是办不到的。就算读篇千把字的文章，“每字问”试试看，一个个字都要问清楚为什么那样读？为什么那样写？它的形成与变化是个什么样子？这恐怕三年五载也不见得能功德圆满；即使把问题一一提了出来，甚至一一都有了答案，也不见得就等于把那篇文章的内容全看懂了。可以预见，头发眉毛一把抓地无所不问，并非学“问”之道。“问”亦有道，这就是要在众多的问题中善于区别轻重缓急，善于抓住该问该疑的“要害”，从所学内容中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来。“切问”云云，大约就包含着“问的是地方”这重意思在内。

“问”就是“疑”，也可以说就是“怀疑”。但是，“怀疑”只在于提出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却不包含判断。也就是说，当疑问提出之时，并不包含对于所读之书、所见之事、所对之理，已经有了什么肯定或否定的先入之见。判断真伪、正误，不是提出问题的缘由，而只能是解决所提问题的结果。所以，判断对于怀疑而言，乃是下一步的事；怀疑，只是提出了需要判断的问题，而不应包含做出判断。对疑问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也可能一时做不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只能把问题摆在那里，听由其悬而未决。但是，疑

问的提出，就必然促使人们去思考，去辨别，去往深层探索正确之何以正确，错误之何以错误，不满足于“知其然”，而力求“知其所以然”。“审问”之后，接下去便是“慎思”、“明辨”，而后才谈得到“笃行”。似乎可以说“学贵知疑”，根据即在于此。确如陈白沙所说，产生疑问是学术进步的契机。

因提出疑问而走火入魔，误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迷途，这类的事例，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都曾经发生过。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派”中，确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献的论断，有时带有这种怀疑主义的倾向。比如片面地强调对古代史实的怀疑、不信，提出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口号，乃至在佐证不足的情况下便把许多古文献判定为伪书。但是，瑕不掩瑜，“五四”后“古史辨派”发动的疑古运动，是对中国历史学起了重要的革新作用的。它犀利地打破了控制中国史学领域已久的泥古崇经的僵化守旧学风，对于推动中国史学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研究的创新，起了石破天惊的启蒙作用。仅仅抓住“古史辨派”的某些论断中怀疑的失误，便把“古史辨派”的“疑古”看成一种绝对错误的思潮，是不公正的。况且，“古史辨派”疑古过程中所作的某些错误判断，其所以错误，并不在于其提出问题、提出怀疑，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回答，即他们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主观武断的论断。禹，在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难道不可以提出怀疑吗？对待这类史事，提出疑问，自然无可厚非。至于如何解决此类疑问，那只能靠学术的实践，只能依据于古文物和古文献来提供证据。当着证据已足时，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自可做出切合实际的答案，有便是有，无便是无。证据不足呢，那

就只能把禹仍然作为古文献中有记载的、但尚未确证的传说
中的历史人物看待。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古史辨派”中有
的学者便断定禹是条虫，当然是错误的论断，不过，可以清楚
地看出，这乃是‘断’之过，而非‘疑’之罪。

武断是学术的大敌，但在防止“否定一切”的片面的时
候，切切不可忘记保持自由的理性思考。不迷信于权威，不
拘束于定论，是学术进步的活力所在，是学术的灵魂。没有
了疑问，学术的生命就必定止息。

有鉴于此，成名的学者们、有权威的专家们，似乎更应具
有理性的态度，能够包容、欢迎，而不是排斥、厌恶与己不同
的学术见解的提出，尤其是得善待那些后生小子们的新见的
挑战。学术事业，是永不止息的滚滚奔流的大江，定于一见、
定于一尊的事，或早或迟总不免维持不下去、“定”不住的。
陈独秀做人，自视过高，免不了常有武断乃至专横的论说，可
是有句话却是说得很不错的。他说：“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
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他本人是不是照
这样做了呢？很难说。但至少这句话是不错的。真心向学
的老少长幼，如果把这句话当做该取法的座右铭，大半不会
有什么坏处。

1998年9月10日 结稿于莱茵河畔